

编者按:本刊特别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冷溶同志以“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及其重大意义”为题,对科学发展观作全面深入的阐述与剖析。我们将分三期刊登。本期刊登文章的第一部分。

科学发展观是对 党的发展思想的全面继承与发展

冷 溶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它与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人民群众的观点,批判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观点,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观点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思想的全部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来源。列宁领导俄国进行了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创造性地提出“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建立工农联盟,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其他工业、农业发展的关系,以及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等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思想,几乎涉及社会主义建设所有的重大问题。这些思想尽管是初步的,但对于后人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毛泽东同志借鉴苏联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论著。他提出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思想。他认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没有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两个方面。他的这些重要观点,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理论来源。

更主要的是,科学发展观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思想。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它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继承发展的关系,

明显地表现在理论思路、基本概念、丰富内涵和语言表述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第一步战略目标,即实现温饱阶段的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的发展思想。在这一阶段,我们党提出并牢固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战略布局。

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20多年的经验教训,坚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全党全国上下对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具有这样的热情和执著的追求,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是中国发展成功的第一位原因。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鲜明和坚定态度,我们党才真正牢固树立起了这个认识。

需要着重指出,邓小平同志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并没有忽视全面发展的问題。他历来是讲全面发展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就体现了全面发展的思想。他说,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上,许多全面发展的思想和战略,最早都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比如,他

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提出沿海和内地发展“两个大局”的思想。他在晚年特别强调，要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避免两极分化，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他说，“分配问题大得很”，“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要合理利用资源，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他高度重视保护环境问题，认为自然环境的保护与经济建设一样，“都很重要”。

《邓小平文选》只收入了两个题词，一个是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的，一个是关于植树造林的，都关系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经常使用“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这样的概念，比如“持续”在《邓小平年谱》中就出现过17次。

应该承认，当时我们讲发展，突出强调的是发展经济。这样讲，主要是基于我们党刚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又处于解决温饱的阶段，突出的矛盾是首先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当时着重强调发展经济，是符合那个阶段实际情况的。

现在，有些同志对科学发展观理解得不全面、不客观，认为是从过去的“以物为本”转到“以人为本”，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为全面发展。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我们党从来是讲以人为本的，只不过没有用这个语言概念而已。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要以人民群众是否高兴、满意、拥护、赞成，作为衡量改革成功的标准，要求把发展的成果落实到老百姓生活的提高中去。那种认为“现在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全面发展”的说法更不妥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直到今天，我们讲科学发展观，第一条讲的还是这个。有人讲，邓小平同志讲的“小康社会”就是指800美元。这也是不对的。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有一篇是1983年他视察江苏时的讲话。当时，他讲了“小康社会”六个方面的特征，包括保障人民的吃穿用，住房，就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精神面貌，社会治安等。这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概念。所以，我们必须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思想。

第二个阶段，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即总体上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阶段形成的发展思想。在这一阶段，我们党开始强调并更加注重全面发展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观点，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学习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明显感到，他讲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全面发展。他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强调实现全面发展。这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吸取了80年代在实际工作中一度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更加强调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纲领，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发展了邓小平同志“两手抓”的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充分体现了全面发展的思想。比如，他强调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994年，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1995年他又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还提出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走既有较快速度又有较好素质的发展路子；提出两个转变的思想，即：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转变为集约式增长。在这一时期，江泽民同志和我们党还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如党中央在1994年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等。

总之，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党越来越认识到并更加强调全面发展的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即建设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应该说，科学发展观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概念，在这个时期已经提出来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思想，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发展思想。这一阶段,我们党分析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针对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全局性的突出问题的情况,及时地、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突出,即中央概括的“五个统筹”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90年代已经开始认识到,但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紧迫。这种紧迫感是2003年初非典发生的时候开始的。

非典疫情的发生主要暴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社会事业发展落后,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问题,这在卫生事业落后这个最薄弱的环节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另一个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因为卫生事业落后主要表现在农村,防控非典的难度也主要在农村。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胡锦涛同志在总结抗击非典工作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说,“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他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的九个方面工作中,第一个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工作”;第二个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五个统筹中,中央最早认识到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并在1994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2001年11月我国加入WTO以后,我们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矛盾的认识也加深了。非典疫情的发生,又使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城乡发展的矛盾有了切身的体会。这样,我们就对五个统筹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认识到了。所以,我们对全面发展的认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一个一个逐渐认识到的。现在,发展不平衡问题已经不是个别领域的现象,而是成为影响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党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上加以思考和解决。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飞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一飞跃的标志,是两个重大概念的提出。

一个是“五个统筹”概念的提出。2003年8月3日,温家宝同志在长春召开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把我们在发展中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概括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更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非典疫情发生时,胡锦涛同志在广东视察期间讲了这样一段话,“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这段话中的新话,就只是一个“观”字,但这个“观”字很重要。所谓“观”,就是对事物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认识。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这说明,此时胡锦涛同志已经开始从全局的战略高度思考发展问题。

2003年8月2日至9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工作时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随后,在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对这一概念做了阐述,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完整表述。以后,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2004年3月全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等一系列讲话中,对科学发展观做了全面系统的阐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面体现并进一步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三个阶段和我们党关于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党的发展思想,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每一阶段的认识,是与那个阶段我们党在实践中面对的问题紧密联系的。科学发展观既继承了前人的探索 and 思想,又是我们党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在发展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全局性突出问题的背景下,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全文待续)

责任编辑:杜梅萍 陈 华